

# 「語」與敘事：中國史傳敘事研究( )

## 以《左傳》為中心的考察

### 一、 中文摘要

史傳發展自成脈絡，在中國敘事史上有重要地位。《左傳》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敘事特點，承上而啟下，代表先秦敘事發展的里程碑。古代史傳有記言、記事之分，其體式分別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。《尚書》之外，《國語》也以記錄言談為主，屬「語」體，不僅記錄「言」，並具有對話性。區分「語」和「敘事」，對照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的相關載述，可進而論述言語記錄如何經過情節編構成為時間之流中的整體敘事。《左傳》敘事，「言、事相兼」，以人物展示的方式，藉對話來推展情節，既能解釋事件本末，並能揭示人物的心志，刻劃其形象。

關鍵詞(key words)：

言(words)

語(discourse)

敘事(narrative)

情節編構(emplotment)

主題(topic)

### 二、 緣由與目的

「敘事(narrative)」已成為當代學術的顯題，在許多學術領域裡都深受關注，形成一個具有跨學科意義的「敘事學(narratology)」的研究領域。就歐美文、史學界的敘事研究而言，依史東(Lawrence Stone)考察，七十年代中期以來，歷史學界有一股「敘事復興」的現象<sup>1</sup>；歷史學者懷特(Hayden White)，則將敘事的議題納入「後設歷史學(metahistory)」的研究中，正視歷史的敘事性，對其虛構性以及修辭問題亦多所探討<sup>2</sup>。懷特取資於修辭學、文學批評，而他的論述又迴響於文學界。

---

本研究計畫提出之後，感謝審查人的寶貴意見，研究範圍略作合理調整。為彰顯中國史傳敘事的發展進程，並使討論議題集中，文本選擇以《左傳》為中心。

<sup>1</sup> 參考史東，“The Revival of Narrative: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,” *Past and Present* No.85(1979), 頁 3-24。

<sup>2</sup> 參考懷特之著作：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73); *The Content of the Form: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*

歷史界關注於敘事的課題，則歷史著作值得分析考辨的不再止於內容事蹟，再現的形式及其對內容的具體形塑，日益受到重視。至於文學界，研究敘事往往仍以神話、小說為主，側重敘事的結構和敘述的表現手法等。文、史學界應可展開更積極的對話。

相應「敘事(narrative)」的研究熱潮，於是不少中外學者回轉於中國，展開「中國敘事」的討論。舉其犖犖大者，1977年浦安迪(Andrew Plaks)主編的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 出版，此後，蒲氏和楊義並有題稱「《中國敘事學》」的專書，傅延修的《先秦敘事研究》以先秦為斷限，論述「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」；專書之外，其它的期刊論文，或在專著中涉及中國「敘事」者，更不在少數。其中，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史傳對小說的影響，尤其先秦兩漢之「敘事」實以史傳為大宗，足以表徵早期中國「敘事」發展的進程，雖然如此，相關研究或者直接援據歐美敘事理論運用於中國的文學作品，如浦安迪即是如此<sup>3</sup>；或者有意「返回中國敘事本身」<sup>4</sup>，實際論述卻仍然侷限於以小說為主的成見，如楊義的《中國敘事學》，書中關於史傳的討論就遠不及小說；至於王靖宇、孫綠怡之研究《左傳》敘事，他們的論文集或題稱《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》，或題稱《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》，從書名就可以略窺其論述傾向：探討早期敘事似乎旨在為小說溯其源頭。

其實，真正貫徹「返回中國敘事本身」之研究，首應明瞭「敘事」一詞乃中國學術傳統固有的術語，其指涉本以史傳為主，學者研究中國敘事卻往往視「敘事」為英文「narrative」的對譯詞，鮮少深究其固有的義涵。漢、魏學者已稱司馬遷《史記》「善敘事」，唐劉知幾《史通》已有名為〈敘事〉的專篇，宋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以「敘事」為文章四體之一，凡此以及學者行文措辭之所謂「敘事」，指稱的實以史傳為主，並非小說。梁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中，綜述經、史典籍，經傳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，史籍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等，凡載述過往人物之言行者，統稱為「史傳」，並特別推崇《左傳》為史傳中的典範。依其描述，此種文體具有「原始要終」的形式特徵，劉知幾稱之為「敘事」<sup>5</sup>，誠可與「narrative」相對譯；若考慮劉知幾等傳統學者所謂「敘事」實以史傳為主要指涉，則近於「historical narrative(歷史敘事)」。

中國敘事的傳統頗不同於歐美，後者有一系列從神話到史詩、到羅漫史、再到小說的發展階段，中國則在神話和小說之間沒有史詩和羅曼史的發展階段，其間最足以表徵中國敘事的主要是史傳。先秦就有以記錄言語為主的《尚書》、《國語》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尤其是史傳敘事的兩大高峰，至魏晉南北朝，正史之外，更有志人、志怪頗以廣見聞、資考證而補正史的樣態出現，唐傳奇以降的各體小說，也常在「傳」的形式及內容題材上取資史傳，所以有人說小說孕育自史傳的母體，史學家或由「能與正

---

*Representation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87); *Tropics of Discourse* (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, 1990).

<sup>3</sup> 「敘事」雖是中國文論裡早就有的術語，浦安迪坦陳他的研究其實是探索「narrative」觀念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運用，說見氏著：《中國敘事學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)，頁4。

<sup>4</sup>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(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)，頁10。

<sup>5</sup> 說詳拙著：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(台北：書林出版公司，1998)，頁94-99。

史參行」的觀點肯定小說，而傳統目錄學家也往往視小說如史傳之附庸。<sup>6</sup> 依準現存的文獻來考察，史傳無疑在中國敘事的發展歷程裡具有重要地位，自成脈絡，並在相當時期裡堪稱敘事的主流，而影響及於小說。研究中國敘事不能不正視史傳自身的發展脈絡，誠能如此，史傳和小說之間的「建設性對話」才能真正展開，以多元的視角建立「中國敘事學」，甚至以這樣的「中國敘事學」對應歐美「敘事學」進行跨文化的對話。這樣，探討中國史傳敘事，誠然是一項有前瞻性的基礎研究。

本人近年由研究《左傳》，進而關注於中國敘事學的領域，注意到《左傳》「言與事相兼」的敘事特點，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意義。一個年度的研究，固不足以觀照中國敘事之整體脈絡，縱使專就史傳敘事而言，也僅能針對先秦，藉由此一時期史傳敘事的幾部典範作品建立指標，俾為上述基礎研究提供貢獻。

### 三、結果與討論

#### (一) 《左傳》在中國敘事史上的指標意義

「中國敘事學」的專著在此研究領域裡自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代表這方面既有的重要成果。由此入手考察，作為參照，無疑可以確認《左傳》是先秦敘事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。更重要的是，其「言與事相兼」的特點，尤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意義，可以作為考察中國敘事發展的指標。

浦安迪主編的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 這本論文集集中，討論早期歷史敘事的其實只有王靖宇的“Early Chinese Narrative: The *Tso-chuan* as Example,” 《左傳》儼然為中國早期敘事，尤其是史傳敘事的當然代表。王氏的說明以為：《左傳》是中國最古老、最著名的史傳典範，並且對後來的敘事作品有巨大影響，所以，藉由這部著作不僅能了解古代敘事，也有助於理解整個中國敘事<sup>7</sup>。浦氏收在上述論文集裡的“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”一文，以及後來出版的《中國敘事學》專著，都曾比較歐美與中國兩個敘事傳統，他追溯中國敘事至《尚書》，而大盛於《左傳》，相應於歐美文學傳統中的史詩(epic)，中國實以史傳取而代之，成為明清小說不斷取擷的資源，在形式結構或內容題材等多方面對小說有重要的影響；他根據班固《春秋》尚「事」(events)而《尚書》尚「言」(words)的區分，謂「言」與「事」為中國敘事交替出現的兩大型式，從神話到明清章回小說，往往「言」重於「事」，常表露出空間感優先於時間感的

---

<sup>6</sup> 以上，參考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式的轉變》(台北：久大文化公司，1990)，頁 225-229 及 250-251；石昌渝：《中國小說源流論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5)，頁 1-12 及 53；浦安迪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頁 8-10；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頁 13-16。

<sup>7</sup> 王靖宇：“Early Chinese Narrative: The *Tso-chuan* as Example,”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P., 1977)，頁 3；並參氏著：《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9)，頁 22-23。

現象<sup>8</sup>。雖然提及敘事大盛於《左傳》，認為史傳在中國敘事傳統裡具有跟史詩類似的地位，而為小說的重要源頭，可惜浦氏對史傳的討論猶相當有限。

楊義的研究認為，商代卜辭中已經有簡短的敘事文字，像這樣簡短的敘事文字還散見於《周易》的卦爻辭，或《山海經》等的片段神話，商周銘文之中也有記述事件的完整過程的篇章，唯其簡短、零散，並未成為敘事的範式，成為範式者當推史傳，這是中國敘事發展的獨特之處；楊氏更將歷史與小說、戲曲並列為敘事作品的三大系統，指出：中國敘事文類的發展往往多種並存，沒有歐美那樣從神話而史詩、再由羅曼史到小說的階段性<sup>9</sup>。浦安迪以史傳取代史詩的說法，仍不脫歐美敘事發展的架構；有別於此，楊義以歷史、小說、戲曲為三個敘事系統，它們並非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循序出現法。戲曲另涉及表演的形式，姑且不論。如上文所言，中國史傳或歷史敘事源遠流長，先秦兩漢已出現高指標的著作，縱使志怪、傳奇或章回小說出現之後，史傳仍然延續推展而自成脈絡。這樣看來，楊氏捨階段說而另立系統說，此一說法值得注意。然而，他雖有「返回中國敘事本身」的自覺，也注意到史傳敘事自成脈絡的重要性，畢竟引而未發。

傅修延為探討「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」，針對先秦的甲骨問事、青銅銘事，乃至口舌傳事等等，作了廣泛的考察，爬梳先秦的「含事」資料可謂宏富。依他的考察，由於古代史職的分工，使得先秦文獻在「記言」或「記事」上有畸輕畸重的現象，謠諺或卦爻辭文辭簡短不足論，其它如卜辭、銘文以及《尚書》、《國語》等，都偏重記言。《尚書》雖有像〈金縢〉這樣言事並茂單篇，僅偶爾一二見，而《國語》中的記事仍頗為零散，《春秋》專主記事而不記言，卻太簡約。相形之下，《左傳》無疑是「先秦敘事史上的高峰」，在此之前，記事弱於記言，真正「實現了敘事行為的題中應有之義——以事包言，使敘事中記言一枝獨秀的局面變為記言與記事的相映生輝」者，非《左傳》莫屬<sup>10</sup>。傅氏運用所謂的「敘事理論」解析上述各種「有秩序地記述」的「含事」材料<sup>11</sup>，界定未免寬泛，不過藉以考察敘事及其傳統的「形成」倒也無可厚非。至於指陳「言」與「事」畸輕畸重的起伏發展，更為考察中國敘事梳理出饒有價值的線索。相對而言，中國古代先是長於記言，記事較弱，《尚書》、《國語》等典籍中雖有敘事，畢竟只是零散偶見而已，《左傳》全書則有許許多多引人入勝的敘事，而且能由言談或動作的記錄進展到有意地撰作，將人物的言、行融貫在整體敘事中相互輝映，誠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敘事性著作。

浦安迪和傅修延都相當重「言」、「事」區分的說法。「記言」、「記事」二分，首先見諸漢人的傳述。《禮記·玉藻》有「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」的說法，

<sup>8</sup> 浦安迪：“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,”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, 頁 314-316；又，氏著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頁 8-33 及 46-48。

<sup>9</sup>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頁 13-16。

<sup>10</sup> 說參傅修延：《先秦敘事研究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9）各個專章之論述，以上綜述見頁 192。

<sup>11</sup> 同上書，頁 6-13。

鄭玄注曰：「其書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其存者」<sup>12</sup>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則說：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；事為《春秋》，言為《尚書》」<sup>13</sup>，左史、右史何者記言，二說恰好顛倒。究竟左史、右史的官職分別如何，姑且不論，至少漢人的說法顯示當時曾有記言、記事二體區分的觀念，前者以記錄說話內容為主，後者以載述動作行為為主，其體式大抵可以由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略窺一斑。徵之於文獻，《春秋》編年而大事記要，絕無言談辭令；《尚書》則載錄許多長篇的誥誓辭命，除〈金縢〉等少數篇章稍具敘事的形式，大抵以某一場合中發言記錄為主。這樣看來，古代史傳的確有偏重記言或重記事兩種體式。漢人的說法或觀念，可以實徵於文獻。

劉知幾已經一語道出《左傳》敘事的特點在於「言、事相兼」，據以指陳其承繼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，而另開新境的發展。劉氏《史通·載言》曰：

古者言為《尚書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職。蓋桓、文作霸，糾合同盟，春秋之時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書》闕紀；秦師敗績，繆公誠誓，尚書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錄：此則言、事有別，斷可知矣。逮左氏為書，不遵古法，言之與事，同在傳中，然而言、事相兼，煩省合理，故使讀者尋繹不倦，覽諷忘疲。<sup>14</sup>

《尚書》未記載齊桓、晉文的霸業，《春秋》不錄穆公〈秦誓〉之辭，劉知幾認為這是由於記言、記事的分工，因而說：「言、事有別，斷可知矣」。「言」、「事」原本分別記載，直到《左傳》始正式邁入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新里程。誠如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所言：「為史之道，其流有二。何者？書事、記言，出自當時之簡；勒成刪定，歸於後來之筆。」<sup>15</sup>「當時之簡」，尤其是古代的記言、記事，原屬記錄的性質，《左傳》擷取這兩大類型的史料，將人物的行為及其言辭融貫於一篇敘事當中，重新排比組織，是所謂「後來之筆」，這樣的敘事乃是撰作，而非記錄。唯其精心融貫，經情節編構而「煩省合理」，於是乎能引人入勝，成為敘事的典範之作。

綜上所述，《左傳》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敘事性著作，而其「言、事相兼」則是中國敘事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。在此之前，史傳偏重記錄，而且記言優於記事，至《左傳》而進入新的里程，能將人物行事及其言談精心編構為情節，融貫為整體，撰作成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敘事。

## （二）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敘事

中國古代史傳有記言、記事之分，《左傳》上承《春秋》一系的記事體發展為敘事，這種重「事」的類型逐漸成為史傳的大宗。但是記言性質的文獻倒也沒有就此消失，《尚書》固為古代記言體的代表，此後，如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（一名

<sup>12</sup> 見《禮記注疏》（影清嘉慶 20 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；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2），卷 29 頁 5 上。

<sup>13</sup> 見《漢書補注》（影長沙王氏校刊本；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5），卷 30 頁 18 下。

<sup>14</sup> 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（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張鼎思覆校陸深本；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）卷 2，頁 10-11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書，卷 11，頁 81。

「事語」), 如《論語》、《孔子家語》, 漢以降還有像《說苑》、《世說新語》、《語林》等等, 以「言」、「語」、「說」題名的文獻。從「言、事相兼」的特點看《左傳》敘事的指標意義, 促使吾人注意敘事對「言」或「語」一系文獻的吸收, 以及敘事中言語對話的運用。

上文曾提及浦安迪的考察, 他說「言」與「事」為中國敘事交替出現的兩大型式, 小說中往往有「言」重於「事」的現象, 使得空間感增強, 超越了敘事的時間感。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者相當重視話本和章回小說的「說話」的虛擬情境, 認為是敘事模式的主要特徵之一<sup>16</sup>。浦氏所謂「言」與「事」為中國敘事交替出現的兩大型式, 所謂「言」的類型大概指此而言。小說虛擬「說話」的情境作為敘事模式, 是否能如浦氏所言追溯至《尚書》等記言體文獻, 尚待探究。切就史傳而言, 人物的辭令或對話在敘事中廣泛運用的情形, 的確值得觀察討論。

劉知幾在《史通 申左》中曾列舉許多《左傳》載錄時人諫言或會盟辭令的實例, 認為:「斯蓋當時發言, 形於翰墨, 立名不朽, 播於他邦。而丘明仍本其語, 就加編次。諒非經營草創, 出自一時; 琢磨潤色, 獨成一手。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, 丘明但編而次之, 配經稱傳而行也。」<sup>17</sup> 古代的言語記錄, 成為《左傳》敘事的資源, 可惜多已亡佚, 無從對照觀察。倒是《國語》和《左傳》相傳同出於左丘明, 前者會集各國之「語」編纂成書, 後者依經敘事, 是融貫史料的著作。《國語》中的「語」應是《左傳》參考的史料之一, 載述內容可以彼此參照比較<sup>18</sup>。以下嘗試藉由「語」和「敘事」的區分, 對照二書中的相關載述, 觀察言語記錄如何經過情節編構成為時間之流中的整體敘事, 進而論述《左傳》在敘事中記言載語的功能。

從早期的文字記載看來, 古代的確有「記言」、「記事」的區分。《左傳》以前,

<sup>16</sup> 參考王德威的論文, 他引述韓南(Patrick Hanan)、浦安迪等學者的說法, 並申述討論, 見氏著:〈「說話」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〉,《想像中國的方法: 歷史·小說·敘事》(北京: 三聯書店, 1998), 頁 80-101。

<sup>17</sup> 同上書, 卷 14, 頁 104。

<sup>18</sup> 關於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二書的關係, 歷來說法極多, 張師以仁考辨最詳贍精闢, 論證二書著作宗旨不同, 且同述一事而時、地、人或事蹟也頗有詳略差異, 雖同出左丘明, 而一為編纂、一為著作, 說詳氏著:〈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〉,《國語左傳論集》(台北: 東昇出版公司, 1980), 頁 19-108; 及〈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〉,《春秋史論集》(台北: 聯經出版公司, 1990), 頁 61-104。近年, 王靖宇復從敘事的觀點比較二書, 同樣獲得《國語》較接近原材料,《左傳》則經過選擇、修飾故全書敘事風格一致, 而且, 前者乃《左傳》參考的原材料之一, 說詳氏著:〈從敘事文學再度看左傳與國語的關係〉及〈再論左傳與國語的關係〉,《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》(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 1999), 頁 135-167 及 169-178。《國語》以載「語」為主, 但也有一些經過潤色而具備敘事的形式特徵, 王氏關於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的比較討論, 主要是針對二書相關的敘事。雖然《國語》中也有具備敘事形式的篇章, 畢竟多偏重記言, 古代遂有「語」的專稱, 藉此, 我們可以根據《國語》確立「語」體的特徵。區分「語」與「敘事」的體式, 著眼於中國敘事的發展論述《左傳》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指標意義, 這是本研究計畫跟先前學者研究的不同之處。

包括卜辭、銘文或《尚書》，言語的記錄已經相當發達，記事則相對地進展遲緩，始終本末完整的敘事只零星散見。《尚書》之外，《國語》也屬於記言體文獻。《國語》的「語」，多為君臣之間的問答記錄，以答辭為主，這是它的基本形式；應答之辭針對主題，有所為而發，有其特定的言說對象，乃當時人物之間的對話。不僅記錄「言」，並且具有對話性，常以「明德於民」為君臣對話的主題，這樣的體式，古稱為「語」，《國語》就是古「語」體的著名代表。<sup>19</sup>參考浦安迪將「言」譯為「words」，凡是說出口的話均屬之，相對的，有的學者將《國語》一類的「語」譯為「discourse」<sup>20</sup>，恰可以強調其因應對象以進諫陳辭或論辨說理的對話性。《左傳》所載雖有冊命誥辭，大抵多屬春秋賢士大夫應對陳說之「語」。依《國語》《左傳》，對比「語」和敘事的關聯，可以略窺此一階段中國敘事發展的演變之跡。

我曾詳細分析〈祭公諫穆王征犬戎〉(限於篇幅，引文不具錄。下同。)這篇「語」，全篇凡五百一十二字，祭公的諫辭四百七十八字，佔了絕大篇幅，前言「穆王將征犬戎，祭公謀父諫曰」，交代祭公進諫的由來和對象，最後則說「王不聽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」，由首尾的背景說明，可知祭公的諫辭涉及周穆王征犬戎的事件，然就內容意旨而言，全篇主體在四百餘字的一長段諫辭。其中，「先王」出現八次，「德」字出現九次，在在依準「先王」，標榜其「德」，而總著眼於保民、恤民；而言語之間，迴環激盪的聲氣音韻，雍雍穆穆的廟堂氣象，具體展現出天子卿士的雍容之姿、文雅之風。總之，這篇「語」載錄祭公之辭，不僅傳達了此一人物的觀念見識，同時在造語修辭中展現了他的聲氣形象。它是《國語》全書載錄的第一篇「語」，就時間而言，也是最早的一篇「語」。〈祭公諫穆王征犬戎〉是《國語》全書載錄的第一篇「語」，就時間而言，也是最早的一篇「語」，具有代表性，而「語」的基本結構及價值，可以藉由上述分析窺見一斑。<sup>21</sup>

《左傳》中載錄許多春秋時代賢士大夫的諫言或辭令，劉知幾說「斯蓋當時發言，形於翰墨，立名不朽，播於他邦。而丘明仍本其語，就加編次」，所本者大概就是當時各國的「語」。如宣三年的〈楚子問鼎〉，楚莊王觀兵于周疆，此傳所述以王孫滿的辭令為主。針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，王孫滿以「在德不在鼎」一句先立定大本，然後將鑄鼎、遷鼎的原委娓娓道來，強調鼎所以「承天休」，再轉出「天祚明德」，以「天命未改」壓伏楚之野心，最後結以「鼎之輕重，未可問也」，將問題彈回，輕柔中帶著勁道。所以馮李驊從他立論陳辭的特色分析說：「劈頭提出『德』，又從『德』推出『天』使他問心不過，又誇口不來，語語峻厲，真足以褫奸雄之魄而消窺伺之萌矣。」<sup>22</sup>一番辭令，由鼎之可問不可藉題發揮，既明確宣示「明德」的觀念，同時假諸「天命」，以微婉而堅定的辭氣促使楚兵不戰而退，

<sup>19</sup> 說詳拙著：〈國語的「語」：形式與內容——從評析「祭公諫穆王征犬戎」出發〉，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》創刊號，頁 1-22。

<sup>20</sup> 同上引文，頁 11。

<sup>21</sup> 同上引文，頁 3-10。

<sup>22</sup> 馮李驊：《左繡》(影康熙 59 年書業堂鐫藏本；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7)，卷 10 頁 10 上。

正是藉由人物的展示，在辭令言語中，讀者感受到王孫滿「禡奸雄之魄而消窺伺之萌」的神態，想見這個人物的形象。此外，如隱三年石碏勸衛莊公「愛子，教以義方」，進而論及「六逆六順」的一番諫辭；桓二年臧哀伯勸阻桓公納郟鼎于大廟，力陳「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」，切不可「寘賂器於大廟」；文十八年太史克代表季孫行父陳辭，論事君之禮以觀莒僕之「凶德」，並詳述舜舉八元八愷而去四凶，表明違君命而逐莒僕乃「去一凶矣」；襄十四年師曠隨侍晉悼公，提及「衛人出其君」，便乘機進說，論「良君將賞善而刑淫，養民如子」，述親暱輔佐、瞽史補察的制度，以為「天之愛民甚矣，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淫，而棄天地之性？必不然矣。」；至於昭二十年，晏嬰侍齊景公于湓臺，也是藉題發揮，暢談「和」、「同」之異；諸如此類的長篇偉論甚多，不勝枚舉。這樣藉由人物展示，在靜態的場合裡侃侃而談，敘事的節奏相對顯得緩慢遲滯，所謂空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象殆指此而言。

如此「言」重於「事」的敘事，跟《國語》的「語」相較，性質近似，很可能直接採錄時人的「語」錄資料，幾乎沒有剪裁或稍作潤色即編入傳中。對於這些名言讜論，錢穆曾予表彰，認為《左傳》中所載的這些賢士大夫言語，其中「就有許多很偉大思想在其內」<sup>23</sup>，杜維運更形容這樣「選擇由文化與智慧湧出的言論而畢載之」，保存了春秋時代的文化氣息，再現其智慧光芒<sup>24</sup>。為什麼《左傳》所載言語具有如此的價值呢？這可以根據「語」的特點來說明：「語」以陳辭說理為主因而有相當強的思想主張；其修辭聲氣又因應特定的對象和場合，於是有個別性，表露出說話人物的文雅和情采。

「語」是因應對象以進言應答的對話，旨在說理達意；敘事則「原始要終」，載述一系列事件的整體脈絡以明其本末。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二書，體式不同，宗旨亦異，載錄的內容自然各隨所取，或者同收某一人物在特定場合的言語而詳略不同，甚至內容互異，可能是根據資料有別，或者參考同一資料而刪裁不同。特就中國敘事發展的觀點而言，古代「語」錄如何吸收為敘事的素材，經編構成為一系列事件中的情節，以及它在整體脈絡中如何發揮敘事的功能，這是下文討論的重點。

長勺之役曹劌和魯莊公的問答，《國語·魯語》和《左傳》有類似的載述，可資以對照，「語」和敘事各有側重的情形顯然可見。《國語》記載曹劌和魯莊公關於「所以戰」的問答，對於「不愛衣食於民，不愛牲玉於神」，曹劌以為根本不足恃，故詳為解說，侃侃而談德惠於民的治道；至莊公再提出「余聽獄雖不能察，必以情斷之」，曹氏曰：「是則可矣」，肯定其能「中心圖民」。這篇「語」開頭的「長勺之役」只提供一個歷史背景，曹劌和魯莊公兩個人物的問答對話在此場景中展示，展示的主題毋寧是布惠圖民的思想。託言以明德，敷陳為政的道理<sup>25</sup>，問

<sup>23</sup> 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8），頁 54-55。

<sup>24</sup> 杜維運：《中國史學史（第一冊）》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3），頁 110-113。

<sup>25</sup> 張師以仁認為：「《左傳》記事，長於戰爭的描述，《國語》託言以明德，故沒有論戰一節，而

答之間，偏重說理達意，而時間的流動或因果的關聯十分模糊。參照於《左傳》敘事，全篇「原始要終」，已具備「始 - 中 - 終」三段完整的情節<sup>26</sup>，相形之下，《國語》所記只相當於起始的問戰一節。設若《左傳》曾參考後者，曹劌言語明顯經過刪裁組織，變得更簡潔而具有節奏感。

進一步分析之前，先將《左傳》敘事分為如下三段情節：

- 1.始於問戰：將戰之前，曹劌鑒於在位者「未能遠謀」，乃主動請見，不顧鄉人勸阻而參與了這場戰爭。請見，問莊公「何以戰？」三審君德之後，方說「可以一戰」，隨即「戰則請從」。
- 2.中則應戰：戰場之上，是應機展現謀略的現場。曹劌跟隨莊公同乘而戰于長勺，待齊人三鼓然後出擊，視轍跡、望軍旗，然後才追逐敗逃的齊師。
- 3.終場論戰：戰勝之後，曹劌應莊公之問，解說戰略緣由。

敘事的三段情節跟戰爭進行的階段相應，一個步驟導引另一個步驟，先後有序，相互聯貫，構成節次分明的整體脈絡。其中，曹劌這個人物是貫串的線索，由入見、請問引發他和魯莊公的連番問答，逐次敘出應戰前後的謀議以及作戰實況，於是首尾瞭然本末連貫；而且，從情節編構的呼應關係看，戰前、戰後的謀議顯然才是重心所在。以曹劌為線索，以謀議為重心，如此再現長勺之役這場戰爭，正以曹劌所謂「遠謀」為關鍵。問「何以戰」，促使莊公明瞭重民、利民才足以用民應敵，而且他說「可以一戰」之後，緊接著要求「戰則請從」。一則，通過一番問答，莊公對曹劌的見識已有所了解，於是允諾他同車以為參謀；二則，曹劌實以一己之謀略彌補上位者「未能遠謀」的空缺。只見戰場之上，曹氏曰：「未可」，魯軍即止，待齊人三鼓然後曰：「可矣」，魯軍即進擊馳逐。交戰的實況先作此描寫，其所以然之故則在戰後說明，進一步表露曹劌慎謀能戰的智略。呼應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」一語，曹劌請見之前，想必已對謀臣將帥以及軍旅形勢，瞭然於胸，從不在其位，到參贊軍機，其間轉變的因素厥在「問何以戰」的一番對話，通過對話贏得莊公信任，於是能同乘應戰，隨機獻議，終使魯國獲得勝利。莊十年《春秋》曰：「春王正月，公敗齊師于長勺。」《左傳》對應經文敘述其事本末，以曹劌及其「遠謀」為關鍵，巧妙揭示了「公敗齊師于長勺」的關鍵因素。

《國語》記載長勺之役曹劌和魯莊公的問答之「語」，著重在說理達意，主題則是布德惠民。相對的，《左傳》則將相關的對話編構為敘事中的一段情節，惠、信、忠等人君之「德」為主政應戰的根本，曹劌此一思想猶然彰著，但不止於此，在敘事本末中，曹劌如何透過對話展現自我，贏得莊公信任，並因而得以同乘而參贊軍機，也都可以由此獲得理解。換言之，經情節編構為的「語」，不僅表現了

---

重點在敷陳其理。正是各略所略而詳其所詳。」（《春秋史論集》，頁 165）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所詳所略誠然各有專主，下文針對《左傳》敘事的線索、關鍵，以及如何解釋《春秋》之義等，稍加闡述，以為補苴。

<sup>26</sup> 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)《詩學》：「所謂『完整』，乃指有開始、中間與結束。開始為本身毋須跟隨任何事件之後，而有些事件卻自然地跟隨於它之後；結束為或出於自身之必然，或出於常理，跟隨於某些事件之後，而無事件跟隨於它之後；中間則必跟隨於一事件之後，而另一事件復跟隨於它之後；是故一個結優良之情節不能在任意的一點上開始或結束；其開始與結束必須依照上述方式。」以上，據姚一葦中譯：《詩學箋註》（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78），頁 79。

說話人物的思想和形象，作為一系列事件裡的一個環節，它還具有解釋前因後果的功能。《左傳》敘事有主題，那就是對應《春秋》經文以解釋「公敗齊師于長勺」的因素。

《左傳》敘事擷取「語」作為素材，藉由人物的言語對話，不僅可以推展情節，同時刻畫人物內在心志，發揮展示其形象神態的功能。

隱元年〈鄭伯克段于鄆〉情節編構的特點就是善用對話。共叔段以京為采邑，進而「命西鄙、北鄙貳於己」，又「收貳以為己邑，至於廩延」，最後準備襲鄭取代莊公，在武姜的支應下一步步擴展勢力。共叔段擴展勢力的四個階段，鄭莊公的反應及變化之微，即形諸人物對話，從而曲傳其「志」。莊公初即位時年紀尚幼，對於叔段在京築城逾越制度，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」，明知關鍵在武姜；從「姑待之」、「將自及」，到明指叔段「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」，語氣漸次趨強，直至掌握武姜和叔段襲鄭的訊息時，態度積極而主動，曰：「可矣」，隨即命將伐京，先下手為強。從莊公即位到「克段于鄆」，對母親姜氏原本無可奈何到最後逐弟寘母，前後長達二十二年，其心跡委曲在語氣態度的轉變中隱隱勾勒。<sup>27</sup>

哀六年〈楚昭王知大道〉，昭王在「卜戰，不吉；卜退，不吉」的情形下，準備從容赴死，特意委請子西、子期繼位為君，兩人拒絕，便轉而懇請子閭，子閭「五辭而後許」。後來，子閭卻與子西、子期共同擁立昭王之子章即位。然後，《左傳》特追述昭王不禱、弗祭兩件事，略見其平生作為並非迷信卜祀，最後以「孔子曰」評論說：「楚昭王知大道矣，其不失國也，宜哉！」肯定昭王能「由己率常」。何以見得楚昭王能不迷卜祀，深明「由己率常」的道理？敘事中載錄他的言語，讀者可以從中明瞭昭王不禱、弗祭的理由。當周太史針對赤雲異象建議昭王：「若禱之，可移於令尹、司馬」，他說：「除腹心之疾，而實諸股肱，何益？不穀不有大過，天其夭諸？有罪受罰，又焉移之？」當卜者宣告昭王之疾導因於黃河作祟時，他以「三代命祀，祭不越望」為理由，謂「不穀雖不德，河非所獲罪也」。由此，讀者也深刻了解到楚昭王這個人物。唯其平日就視國家一體，視大臣如股肱，臨戰將死之際，「捨其子而讓」的安排庶幾免於權謀之虞，而獲得子閭和子西、子期等人感念，一致擁立公子章，成就讓而不失國的佳話，樹立起楚昭王「由己率常」的開明形象。

〈楚子問鼎〉中的王孫滿，在靜態的場合裡侃侃陳辭，這一類的敘事，情節顯得單調遲滯；〈鄭伯克段于鄆〉以人物往返對話，一步一步地推展推展情節，時間的流動感相對地淡化，如此般的敘事往往使讀者忽略當中的時間流程。由此看來，《左傳》敘事中已經顯露出浦安迪所謂中國敘事往往「言」重於「事」、空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象。就《左傳》本身來說，這種傾向跟對應《春秋》之事而詳述其本末的宗旨很有關聯。《春秋》編年記事，或月或日，每事繫於一個定著的時間點，《左傳》敘事則對應於經，針對事繫於經的時間點舒綻出一段「原始要

<sup>27</sup> 對於〈鄭伯克段于鄆〉的分析，說詳拙著：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，頁168-174。

終」的時間流程，一系列事件在此展開。〈鄭伯克段于鄆〉全篇只凸顯「五月辛丑」叔段由鄆出奔共的時間點，〈楚昭王知大道〉也只載明「秋七月」楚昭王在城父，當月「庚寅」便卒於此，而這樣對於特定時間點的強調，恰與《春秋》記事的時間相對應。閱讀《左傳》敘事，不應忽略此種經傳對應的關係。這涉及《左傳》敘事的主題意向。

### (三)記言載語的模擬問題

《左傳》依其敘事的主題意向選擇素材，編構情節。敘事中的言語辭令，只要不刻意忽略古代的記言傳統，劉知幾「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」而「丘明仍本其語，就加編次」的推想，應可以接受。然而，只要經過選擇和組織，編構為情節，總已經是敘述者依其理解所再現的人物形象和事蹟本末，這樣，史傳同樣涉及模擬的問題。

錢書鍾曾指陳，史傳工於記言者莫先乎《左傳》，這是「左氏於文學中策勳樹績」的一大要項。他說：

史家追敘真人真事，每須遙體人情，懸想事勢，設身局中，潛心腔內，忖之度之，以揣以摩，庶幾入情合理。蓋與小說、院本之臆造人物、虛構境地，不盡同而可相通；記言特其一端。《韓非子 解老》曰：「人希見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案其圖以想其生也；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，皆謂之象也。」斯言雖未盡想象之靈奇酣放，然以喻作史者據往跡、按陳編而補闕申隱，如肉死象之白骨，俾首尾完足，則至當不可易矣。《左傳》記言而實乃擬言、代言，謂是後世小說、院本中對話、賓白之椎輪草創，未遽過也。<sup>28</sup>

意謂史傳敘事之記言載語，其實是代言、擬言，跟小說對白「不盡同而可相通」。藉錢氏的話說，史傳和小說，編構情節都需經一番揣摩想像，所以說二者「可相通」；但就想像之有無史料根據，以及是否與真實世界一致等要求而言，二者又「不盡同」。儘管《左傳》所述之言語辭令，尤其是人物之往返對話，以及若干私語或獨白，未必完全合乎史料根據，大抵據成文、本其語，徵實有驗地建構往昔人物行事的情貌原委，這屬於歷史的想像活動。小說的模擬想像，則可以自由臆造，盡情虛構其可能的世界，任意隨心以求生動出奇，不必要求其符合史料根據，不必與真實的世界一致。<sup>29</sup>

無論如何，錢鍾書從記言載語的模擬性論《左傳》和後世小說的關聯，謂有「椎輪草創」之功，的確洞察到中國敘事發展上饒有意義的現象。《左傳》「言、事相兼」，一方面吸收古代記言載語的傳統經驗以豐富敘事，一方面在理解揣摩以模擬想像上也對後來包括小說的敘事發展，有草創啟發之影響。由此看來，《左傳》

<sup>28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錐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），第一冊，頁164-166。

<sup>29</sup> 理論上，真實的跟虛構的世界不同，真實的世界是唯一的，凡此世界內的種種須能合乎一致，是否合乎一致則可藉由歷史考據的方法來檢驗。至於虛構的世界，並非唯一，不同的小說造設不同的世界，不必與其它的世界（包括真實的世界）一致，只要合乎可能性而可以理解。說並參拙著：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，頁174-175。

在中國敘事史上的確具有承先啟後的指標意義，而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敘事特點尤為關鍵，值得學者注目和研究。

#### 四、計畫成果自評

中國敘事學是一個具有跨學科意義的新領域，將有助於文學、歷史學等學科領域之整合研究，可作為中國學術與其他學術傳統進行「對話」的一個進路。而史傳興盛，自成一發展脈絡，這是中國敘事的特色。當前中外學者之「中國敘事」研究偏重小說，忽略史傳，此一狀況固當針砭；但史傳研究者雖不乏人，可惜仍少關注其敘事性。這正是文學與歷史學可以相輔相成之處。本研究計畫以《左傳》為中心考察先秦史傳敘事的發展。

由考察幾部「中國敘事學」的專著，益見《左傳》是先秦史傳敘事的重要里程碑。我認為，《左傳》「言、事相兼」的敘事特點，尤其具有承上而啟下的指標意義。

古代的文字記錄，從卜辭、銘文到《尚書》這部文獻，大抵偏重記言。記言體之中，有一類特別稱為「語」，如《國語》就是古「語」體的著名代表。《國語》的「語」，多為君臣之間的對答，偏重說理，而常以「明德」為主題。應答之辭針對主題，有所為而發，這樣，「語」不僅是說話的記錄，而且具有對話性。敘事則「原始要終」，將一系列事件經情節編構而成為完整的脈絡。《左傳》敘事擷取古代豐富的言語記錄作為素材，融貫編構，乃是有主題意向的著作。其中，人物的言語辭令，成為系列事件中的一個環節，於是有表露人物心志、刻畫人物形象的功能。這屬於展示的手法。人物在特定的情境場合中展示，情節或顯得單調遲滯，時間推移的流動感也相對模糊，凡此，顯露《左傳》敘事已經出現浦安迪所謂中國敘事往往「言」重於「事」、空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象。這種傾向跟《左傳》對應《春秋》之事而詳述其本末的宗旨大有關聯。雖然「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」而「丘明仍本其語，就加編次」，依主題意向選擇、組構，再現的乃是敘述者依其理解形塑的人物形象和事蹟本末，這樣，史傳同樣涉及模擬的問題。從敘事之再現總免不了模擬而言，錢鍾書指《左傳》記言乃是擬言、代言，認為啟發了後世小說之對話，這是很有意義的評論。

上述研究成果，針對中國敘事自身的特點建立指標，並為「中國敘事學」之開展與深入研究提供論述基礎。

#### 三、參考文獻

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（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張鼎思覆校陸深本）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。

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)《詩學》著、姚一葦譯註：《詩學箋註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印行，1978年(5版；1966年初版)。

- 馮李驊：《左繡》(影康熙 59 年書業堂鑄藏本)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7 年。
- 錢穆：《中國史學名著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88 年(6 版；1973 年 1 版)。
- 錢鍾書：《管錐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 年(2 版 5 刷；1979 年 1 版)。
- 張以仁：《國語左傳論集》，台北：東昇出版公司，1980 年。  
 ，《春秋史論集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0 年。
- 王靖宇：《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9 年。  
 ，《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9 年。
-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，台北：久大文化公司，1990 年。
- 孫綠怡：《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 年。
- 沈玉成、劉寧：《春秋左傳學史稿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。
- 杜維運：《中國史學史(第一冊)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 年。
- 倪豪士(W. H. Nienhauser, Jr.)：《傳記與小說》，台北：南天書局，1995 年。
- 石昌渝：《中國小說源流論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5 年(1 版 2 刷)。
- 浦安迪(Andrew Plaks)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 年。
-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。
- 張素卿：《敘事與解釋——左傳經解研究》，台北：書林出版公司，1998 年。  
 ，〈國語的「語」：形式與內容——從評析「祭公諫穆王征犬戎」出發〉，  
 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》創刊號(1999 年)，頁 1-22。
- 王德威：《想像中國的方法：歷史·小說·敘事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8 年。
- 郭丹：《史傳文學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9 年。
- 傅修延：《先秦敘事研究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9 年。

Benveniste, Emile.

1971 *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*. tr. Mary Elizaluth Meek. Miami: Miami UP.  
 Chatman, Seymour.

1980 *Story and Discourse: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*. Ithaca: Cornell  
 UP.

Plaks, Andrew H., ed.

1977 *Chinese Narrative: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*. Princeton: Princeton UP.

Stone, Lawrence.

1979 "The Revival of Narrative: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," *Past and  
 Present*, No.85, 3-24.

White, Hayden.

1973 *Metahistory: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Europe*.  
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.

1987 *The Content of the Form: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*.  
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.

1990 *Tropics of Discourse*.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P.